

毀滅與新生 II

——土耳其的威權體制與民主歷程

我們不了解世界，所以吃足苦頭。你們看看，這土耳其和伊斯蘭國度的災難和創傷是多麼的深重鉅大吧！這就是拒絕遵循文明的訓示去提高和改變思想的結果。……文明像一場熊熊烈火，它將焚毀所有不順從的人。

——凱末爾①

1918年11月13日下午，一位心情沉重的中年將軍風塵僕僕地趕到伊斯坦堡。他在亞洲岸邊海德巴沙(Haydarpaşa)火車站下車時，正好看見長達十哩的英、法、意聯合艦隊魚貫駛過馬爾馬拉海，進入波斯普魯斯海峽。不多時，金角河(The Golden Horn)口已碇泊了黑壓壓的一大片船艦，那森林般的桅杆一時似連城上的托卡比皇宮也都要遮蔽了。幾日後，法國將軍艾斯柏希(Franchet d'Esperey)騎在無韁轡的高頭白馬上，率領大軍入城作凱旋巡遊。就這樣，歐洲基督教國家以「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同樣的姿態，重臨君士但丁堡，為奧斯曼人四個半世紀的霸業打

上句號②。甚至，也要為這些從中亞細亞草原闖到歐洲邊上來的土耳其人的命運作最後解決——最少，當時以英相勞合喬治(Lloyd George)為代表的大部分西方政治家都這樣想③。

這樣一種結果將會是順理成章的事。在當時，帝國海外屬土已喪失殆盡，它的老根據地安那托利亞(Anatolia)則在列強為之撐腰的鄰近民族虎視眈眈下，等待瓜分。至於帝國本身，也是滿目瘡痍：原來執政的革命黨已經完全喪失民心，它的三巨頭畏罪潛逃；在位的蘇丹庸懦無能，一味以討好列強自保為能事；至於頗有名望的凱末爾將軍，雖然兼程趕回京城，奔走於首相、國會議員和蘇丹

就這樣，歐洲基督教國家以「征服者」的姿態，重臨君士但丁堡，為奧斯曼人四個半世紀的霸業打上句號。

本文第一部分經在本刊第七期(1991年10月號)發表

之間，游說他們採取振作和強硬態度，但人人置若罔聞。這時，整個國家的意志好像已經完全癱散，只是等待命運主宰而已。前此二百年的現代化努力似乎是完全白費了：這屬於中世紀的「軍事神權國」無論如何改造，終將不能逃過滅亡與沉淪的命運。

然而，勞合喬治和整個西方世界都錯了：帝國雖然滅亡，它的民族卻沒有沉淪，也沒有任憑列強宰割處置。大戰結束後短短四年間，土耳其共和國就像火鳳凰一樣在奧圖曼帝國的灰燼中冉冉升起來了。赤手空拳的凱末爾非但組織國民軍打敗入侵的希臘大軍，爭得了土耳其主權與領土的完整，而且毅然掃除帝國舊制，建立起一個相當世俗化、西方化的共和國。兩百年來可望而不可即的「現代化」好像應驗了「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那幾句話，在帝國最黑暗，最低沉的時刻，就驀地來臨了。

這突如其來的「新生」到底是怎麼樣一回事？與其他追求現代化的帝國對照，土耳其民族的經歷顯示了些甚

麼？這些問題不是本文所能完全回答的，但我們會提出一些初步看法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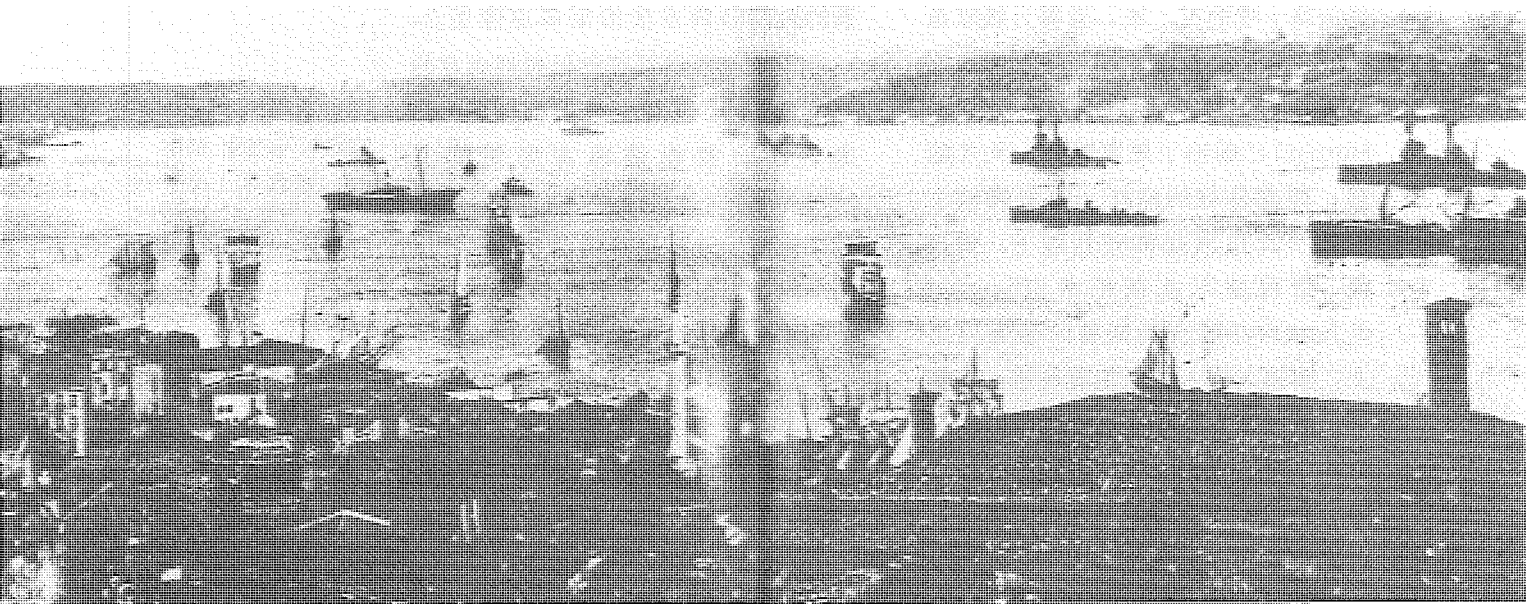
一 奧圖曼主義的興衰

從十八世紀初開始，奧圖曼帝國為了保持「軍事神權國」的結構，掙扎了足足一個世紀(1716-1826)；「吉祥事變」後，它在大一統帝國的格局下，推行類似「自強運動」的「新政」和「新秩序」運動，然而經過四十年努力，這顯然也失敗了。因此，帝國被逼再一次走上探索之路，尋求新的體制和立足點。這探索持續了半個世紀(1866-1918)，經歷了三個不同階段，但始終未曾脫離「作必要變革，以求維持帝國生存」這十分保守，可以通稱為「奧圖曼主義」的思想模式。

甲 文化新潮與立憲思想

探索的第一個階段，是前後持續了十年(1866-76)的「奧圖曼青年」運動④。它的主角是前此四十年改革培

圖 勝利的聯軍艦隊泊在伊斯坦堡的金角河口(1918年12月)



養出來的新型知識分子。他們出身世家，受過良好傳統的教育，通過在翻譯局、外交部之類機構工作而獲得對西方（特別是法國）語言、文化、思想的深入認識；然後，由於不得志於當時狹隘的政治體制，所以轉向報章、雜誌、書刊等新興大眾傳媒發展，成為傳播思想的文學家、評論家、輿論主宰。像這運動的前驅，有鉅大影響的《思潮》半周刊創辦人辛納西（Ibrahim Şinasi, 1826–71），以及它的中堅，辦過《思潮》、《自由》、《伊北列》等多種刊物的那覓·凱末爾（Namık Kemal, 1840–88），便都是這樣的人物。

「奧圖曼青年」是一個有類於「五四」的文化運動：它通過大量翻譯以及新文學創作，掀起了一個白話文運動和一股強烈的新思潮。所謂「白話文」，就是多個世紀來深受波斯和阿拉伯語影響，充滿陳腐套語的奧圖曼官式語文的簡明化、本土化，以求使它成為大眾能夠了解和自由運用的傳播工具^⑤；所謂新思潮，就是大量西方觀念，諸如「祖國」、「自由」、「權利」、「公民」等等的輸入和應用，以及一種務實、開放、求新知、求進步的心態之形成。而這運動最重要的一個意義就是：文化與政治議論被從宗教與政府的獨佔解放出來，成為民間所關心，所參與的事。

同時，「奧圖曼青年」也是一個政治運動。它的中心思想由那覓·凱末爾發揮得最為透徹，而大致上可以「從伊斯蘭經典找尋西方政治思想的根據，以憲法與國會節制中央政權，特別是相權」這兩點來概括。這思想背後的一個假定（或更應說希望）是：只要帝國政治架構公正、合理，那麼它就能贏得治下各個不同民族的忠誠

與擁護。因此，要維護帝國，最根本的途徑是立憲——這就是「奧圖曼主義」的中心思想。在實際行動上，「奧圖曼青年」的策略是以政變方式廢黜貪墨縱恣的在位蘇丹，另行扶植能夠實行他們理想的賢君。這希望在1876年阿都拉節被廢，阿都哈密二世（Abdülhamit II, 1876–1909）登基，並且宣佈立憲和召開國會時似乎實現了；然而，經過不足兩年的試驗，阿都哈密就決定放逐大臣、解散國會、廢止憲法，走向全面獨裁的舊路上去。

倘若將「奧圖曼青年」運動和中國1894–1911的維新與革命運動相比，前者顯然溫馴保守得多了；它令人失望的結局，也許可以大大減少我們對「百日維新」以及1905年憲政運動失敗的扼腕與慨歎吧。

乙 獨裁下的改革

阿都哈密在警衛森嚴的伊迪茲皇宮（Yıldız Palace）以獨裁獨斷的方式統治帝國凡三十年（1878–1908），這是探索的第二個階段。在這階段不僅新思潮和憲制被全面否定，甚至早期由大臣推動的「新秩序運動」乃至最早期由馬穆二世親自推行的新政，也都間接受到質疑，因為阿都哈密不信任大臣，而且着意培植宗教勢力，用它來對抗新思潮。

儘管如此，阿都哈密卻並非單純的暴君，而仍然是一位改革家。他清楚了解帝國非改革無以求進步，非進步無以求生存的道理。只是他認為，在國勢危殆時，任由大臣擅權或國會議論紛紛，那徒然造成混亂，於事無補，因此當務之急是集中權力，穩定大局，以求長期有系統地推行實務建

「奧圖曼青年」運動令人失望的結局，也許可以大大減少我們對「百日維新」以及1905年憲政運動失敗的扼腕與慨歎吧。

阿都哈密的三點指導思想是，政治上厲行鎮壓，文化上利用傳統，實務上仿效西方。

設^⑥。由此，生出了他的「政治上厲行鎮壓，文化上利用傳統，實務上仿效西方」這三點指導思想。這是自相矛盾的文化、經濟、政治分別對待主義，但它理念上雖然可笑，實際上卻有相當成功的一面。

哈密的政治鎮壓，手法和早半世紀的俄皇尼古拉斯一世如出一轍：把權力集中到皇帝親自掌管的官僚機構；以特務系統和檢查制度威嚇人民、箝制言論；以監禁、流放、收買、分化等手段對付國內外異己分子，等等。而利用傳統，辦法亦相類似：以宗教儀式堅定人心；以經費扶植教士和教會學校；以阿拉伯語和伊斯蘭文化對抗西方觀念；甚至大量起用中東和阿拉伯人，抵消巴爾幹人勢力。

這一套以維護傳統和鞏固皇權為前提的嚴密部署自然激起知識分子的強烈反感，但也的確贏得下層民衆擁護，造成穩定局面，為種種務實工作創造了條件。這些工作包括：全面整頓財政系統；重建軍隊和軍事裝備；興建公路、鐵道、電報等交通和通訊網；以種種措施促進農業、工商業；並且大力發展教育，特別是中等和專科教育。無可否認，這一切為帝國帶來了進步最迅速、最穩定的三十年。然而，進步本身就包藏着令獨裁政權崩潰的種子，只不過它的發芽、滋長比較緩慢而已。

丙 光榮革命

1908年6月初，帝國西端馬其頓山區的第三軍士兵發生了那幾年間常有的騷亂。伊斯坦堡照例派出調查官和密探處理，但騷動並不止息，反而擴大；7月7日欽差大臣沈師(Semsi

Paşa)在光天化日之下遇刺身亡，跟着軍中不斷有人呼籲恢復行憲。這時慌了手腳的阿都哈密急忙派遣親信部隊前往平亂。但一切都太晚了：部隊運抵撒羅尼加(Salonika)之後反而投向亂軍，馬其頓各城鎮紛紛起義。到7月24日蘇丹認清大勢已去，自動宣佈恢復1876憲法並召開國會。這便是事先毫無朕兆的「土耳其青年」(Young Turk)革命，它不但對自以為穩如泰山的蘇丹以及耳目靈便的各歐洲使節是個晴天霹靂，即使對革命黨人本身也完全出乎意料之外^⑦。

「土耳其青年」究竟是誰？他們不再是帝國精英分化的產物，也再沒有任何家世憑藉，而是教育普及後，從下層群衆湧現的愛國志士。他們全是從新式中學和專科學院受教育，並且有相當一部分是土俄戰爭後帝國被迫割讓大幅領土而產生的流民，所以危機感特別深切。這些青年人在1889年所組織的最早秘密愛國團體稱為「聯進會」(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 簡稱CUP)，這便是1908年同名革命黨的前身。

這一股新興力量的蓬勃發展有三個因素：第一，隨着教育、經濟發展，帝國內出現大量書籍、報刊。它們以文學創作、科學論述、百科全書等非政治形式把新思想、新事物介紹給大眾；同時政治上的保守與開明之爭投射到文化層面，形成「國粹」、宗教、阿拉伯文化，與物質主義、自然主義、俗世主義、自由主義、西方文化這兩方面之間的鬥爭。保守派在文化論爭中的徹底失敗為革命思想的散播提供了最好機會^⑧。第二，從歐洲秘密會社(特別是「共濟會」Free Masons)革命黨人學會建立嚴密組織。它以隱秘的「中央委員會」為核

心，聯繫着許多獨立小組，群眾運動因而獲得了靈活的指揮和擴展方式。第三，革命黨在九十年代數次起事失敗後，一部分黨員流亡到巴黎，在那裏辦報（其中以里查Ahmet Rıza的《諮議》最悠久和重要）、開會、發表宣言；另一部分則分散到安納托利亞各地，繼續宣揚革命，這樣，革命種子反而到處散播生長。待得它在遠離首都的第三軍中下級士兵間生根之後，很快就成為不可抑止的力量。

「聯進會」雖然是獨裁和高壓下產生的秘密革命團體，然而它的目標卻極之溫和保守，和同時代的俄國社會黨或中國革命黨恰成強烈對比：他們要求的，始終不過是恢復1876憲法與召開國會而已！而蘇丹哈密被逼照辦之後，他們就積極競選去了。甚至翌年發生保守勢力政變，第三軍被逼入京平亂之後，「聯進會」的反應也僅僅止於廢黜哈密，另立新君，以及修憲限制君權而已。這樣，通過與「光榮革命」相類似的方式，「聯進會」把帝國帶進憲政時期。

丁 憲政與災難

令人慨歎的是，兩代愛國志士歷四十年努力爭取得到的憲政，不但沒

有帶來富強，反而將帝國引向災難深淵。這意外結果其實不難理解：第一，發揮憲政優點的妥協與制衡機制不可能在短期建立；第二，在當時極度危急的國際情勢下，帝國需要的是決斷，而非猶疑與爭論；第三，「聯進會」揭櫫的「奧圖曼主義」太脫離巴爾幹民族主義高漲的現實，可說只是一廂情願的幻想。

在憲政前半段，即1909-13四年間，「聯進會」佔了國會中的絕大多數，但他們的政策則是以謙讓態度，尋求與軍政元老以及其他黨派合作，組織聯合政府。可惜這政策並不成功：它徒然造成不斷的人事傾軋和政策搖擺，引致巴爾幹民族主義分子乘時崛起，發動兩次猛烈戰爭(1912-13)，使帝國喪失巴爾幹半島和馬其頓地區，由是徹底埋葬了以帝國為本的「奧圖曼主義」；以民族為中心的「土耳其主義」轉而成為革命黨人的指導思想。在內憂外患交迫下，以安伐(Enver Paşa, 1881-1922)為首的少壯派終於發動政變，用非常手段逼迫蘇丹讓多數黨組織政府，由是證實了憲政和聯合政府政策的失敗。此後五年(1913-18)，「聯進會」毅然負起領導政府的全責，由是演變成革命黨專政的局面◎。

「聯進會」雖然是獨裁和高壓下產生的秘密革命團體，它的目標卻極之溫和保守，始終不過是恢復1876憲法與召開國會而已！

圖「聯進會」三巨頭安伐(左)、泰勒(中)與占馬(右)



收攬大權之後，「聯進會」立刻犯了一個致命的大錯，即決定投向德、奧陣營，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這部分固然是英法拒絕與帝國修好結盟所致，但急躁與好大喜功的安伐將軍念念不忘重振軍威，沉醉於恢復舊日版圖的迷夢，也未始沒有相當關係。鼓動土耳其民族凡四百年的尚武精神，直到此時仍然在發生作用。

另一方面，在這五年間，「聯進會」的內政卻是踏實和成功的。這主要是深受涂爾幹(Emilé Durkheim)影響的思想家和社會學家居卡爾(Ziya Gökalp, 1876-1924)的功勞。居卡爾曾因參加革命入獄，其後歸家閉門，潛心鑽研西方社會學與心理學凡九年，革命成功後始進入「聯進會」核心^⑩。在黨內巨頭泰勒(Mehmet Talat, 1874-1921)支持下，他大力推動結束上一世紀俗世和宗教司法、教育系統並存的混亂局面，將教士掌握的社會功能收編入政府系統內，推動民法的世俗化，提高女權。同時，居卡爾又致力於土耳其民俗、歷史、美術、故事的研究與傳播，和建立宣揚民族主義的全國性通俗教育組織「土耳其之家」(*Türk Ocâgr*)，以求喚起大眾的文化與民族自覺。這樣，在大戰炮火連天之中，革命黨中的實幹家不聲不響地落實了哈密王朝時期醞釀的俗世思想，並且為「土耳其主義」鋪平了道路^⑪。

作為帝國探索出路的最終階段，憲制和「聯進會」終也歸於失敗。然而，結束帝國六百年歷史的，卻並非盟軍，也不是在盟國鼓勵下入侵的希臘大軍，而是土耳其人自己。這和一百年前毀滅「近衛軍團」的，不是基督教國家軍隊，而是它名義上的效忠對象蘇丹，如出一轍。

然而，結束帝國六百年歷史的，卻並非盟軍，也不是在盟國鼓勵下入侵的希臘大軍，而是土耳其人自己。

二 凱末爾的新威權體制

1919年5月16日晚上，在他回到伊京之後整半年，也是希臘軍隊在盟軍慫恿下入侵土耳其翌日，凱末爾避過海關檢查，搭上一艘名為*Bandırma*的貨輪。三日後，他帶着幾個隨員，打着巧妙游說得來的「安納托利亞軍隊巡查使」名號，到達了安納托利亞東北岸的森松(Samsun)港^⑫。這就是土耳其三年民族獨立戰爭和十年國家、文化重建運動的起點。它所引發的，不復是維新改革，而是土耳其民族對整部帝國歷史、整個奧圖曼文化的重估與清汰，是一場有如俄國1917或中國1949革命那樣翻天覆地的變動。

(甲)命運的樞紐

穆斯塔法·凱末爾(Mustafa Kemal, 1881-1938)像「聯進會」許多中堅分子一樣，本都是同一圈子裏的傑出少壯軍官——其實，他還應算是「聯進會」創始人之一。然而他個性耿介，不肯唯諾附眾，所以前半生飽受壓抑、排擠。1915年他奉命負責防守韃韃尼爾海峽，經過一年浴血奮戰擊退數十萬英法聯軍，令英國海軍大臣邱吉爾掛冠，但這樣的功勳也未能改變「聯進會」對他的敵視^⑬。倘非1918年全國陷於癱瘓無主狀態，綽號「灰狼」的凱末爾恐怕是絕難有機會在保守、朋黨結連的奧圖曼社會脫穎而出，暢行其志的。

到達安納托利亞東部之後，凱末爾和四位同謀密友 Rauf, Fuat, Refet, 以及Karabekir將軍等所採取的策略^⑭，第一步就是以本地土耳其



圖 作為共和國起點的施瓦斯代表會(1919)：前排自左至右為Refet, 凱末爾, Rauf。

人成立的「權利保障協會」為基礎，連續在伊塞隆(Erzurum)和施瓦斯(Sivas)召開代表大會(congress)，成立協會的常務組織，發表保衛國土完整和主權獨立的宣言。這表面上只不過是擴張地方勢力的舉動，它真正的意義則是：在伊斯坦堡的帝國政統之外，另外建立一個扎根於安納托利亞，並且以當地民眾為基礎的政治實體。

策略第二步，是利用伊京國會爭取政治合法性。在東部「代表會」宣傳、游說下，國會推翻了已經密秘應允接受英國托管的政府。同時，在國會改選後，被國民分子控制的新國會在1920年2月突然正式通過以「施瓦斯宣言」為藍本的「國民公約」(National Pact)，確定民族自決和領土完整兩大原則。這戲劇性發展逼使憤怒而尷尬的英軍全面佔領伊京，強行解散國會，並逮捕與流放議員，由是完全摧毀了蘇丹傀儡政府的合法性。同年4月，東部名正言順地召開了由106位脫逃的原議員以232位新選議員組成的「國民大會」(The Grand National

Assembly)，選出大會主席(Chairman)、國務會議「總統」(President)(凱末爾僅以一票之微險勝對手當選)以及各部部長，組成代表全民行使主權的「國民政府」。

同盟國這時一面脅迫蘇丹簽訂喪權辱國的Sèvres條約，一面鼓勵入侵的希臘軍東進，對抗焦點因而從政治轉向軍事。我們在這裏自不必詳細敘述其後兩年間(1920-22)凱末爾和他的得力副手伊茲梅(Izmet，後改名伊嫩努İnönü)指揮國民軍奮勇遏止希臘大軍挺進，然後在鄧魯平那(Dumlupinar)一役將之徹底擊潰的經過。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期間，由於軍事和外交上的迫切需要，凱末爾權力日增：他不但是總統和相當於執政黨的「權利保障協會」主席，而且更憑巧妙的政治手腕，獲國會委任為「全權總司令」，可說是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亦正由此，他得以壓制國會內各種不同主張，堅持自己的軍事判斷和小心部署，在適當時機傾力一擊，獲得對希臘戰爭的決定性勝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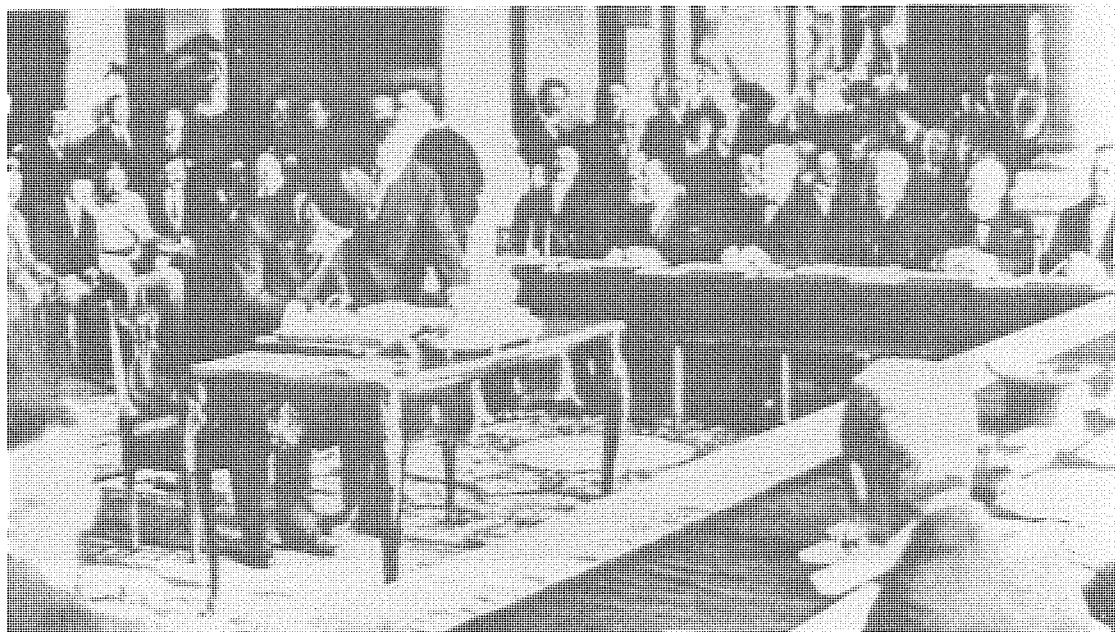


圖 蘇丹代表被迫簽訂Sevres條約(1920)

(乙)共和國的出現

勝利來臨後，凱末爾成為全國崇拜的英雄，權力更加鞏固不可動搖。他的親密戰友這時勸他蹈高引退，成為超乎實際政治的領袖，讓民主自由發展。他卻決志避免重蹈「聯進會」的覆轍，要利用這難得的威望與權力來完成自己的使命。在具有無比信心的凱末爾看來，奧圖曼歷史就是土耳其民族墜落與迷失於阿拉伯和波斯中古習俗、心態的歷史，他自己的使命就是淨化這民族，改造這國家，使它成為現代文明的一部分¹⁵。

改造第一步，是廢除已經有六百年歷史的蘇丹。今日看來似乎順理成章的這一步，當日在國會中卻引起了軒然大波，不但辯論爭持不決，甚至國民運動中堅分子也不表支持。最後凱末爾只有訴之於恫嚇，宣稱主權和大位不是由學理或論辯決定，而是由武力決定的：奧斯曼子孫既用武力盜

竊主權，人民現在亦正好以武力奪回，倘若國會不能看見這一點，那麼真理自會彰顯，但恐不免要人頭落地，等等。在這樣的脅逼下，國會終於順從了，而日暮途窮的穆罕默德六世亦只好倉惶出走，這是1922年11月間的事。

1923年是建國運動的關鍵時刻。凱末爾一方面支持戰友伊茲梅與同盟國談判，爭取實現「國民公約」的要求；另一方面則組織自任黨魁的「人民黨」（後來改稱「共和人民黨」），積極參加國會改選。到秋間這兩項目標都達到了：七月的洛桑條約承認了土耳其當時實際控制，包括東色雷斯(Thrace)在內的疆界，治外法權撤消了，十月初外國軍隊又撤離伊斯坦堡；在九月的選舉中，人民黨囊括了絕大部分議席。

改造第二步，是確立國體。然而，到這個時刻國會議員仍議論紛紛，有認為凱末爾應自立為蘇丹的，有主張「加里發」(Caliph)應當是法定

在凱末爾看來，奧圖曼歷史就是土耳其民族墜落與迷失於阿拉伯和波斯中古習俗、心態的歷史，他自己的使命就是淨化這民族，改造這國家，使它成為現代文明的一部分。

大總統的，總之都還脫離不了「國不可無君」的思想。凱末爾對說服黨內這些頑固的議員並無把握：況且，議員中已經以自由主義和君憲主義者 Rauf 和 Fuat 為中心，開始形成反對圈子。因此，他只好製造內閣危機，然後突如其來地，把確定共和政體以及大總統制的新憲法先後交付人民黨和國會以閃電方式通過，並且，在沒有對手的情況下立即當選大總統。就這樣，在1923年10月底，共和體制終於勉強建立起來。

然而，戰鬥並未結束。廢除蘇丹的時候，凱末爾須另立阿都默節二世為「加里發」；制定共和的時候，他又被逼接受在憲法中申明土耳其是伊斯蘭國家。因此國內外的宗教勢力仍然環繞阿都默節的地位、特權，以及「加里法」制度的本質等問題議論紛紛，希望重新建立一種宗教體制。再一次，凱末爾抓住了國外過火宣傳引起的反應，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將廢除「加里法」和一連串相關的法案提交人民黨內部會議以及國會，在一片激動、混亂之中強行令其通過。這是改造的第三步，也是對傳統體制致命的一擊：加里法、教長 (Sheikullislam)、聖法 (şeriat)、宗教事務部、宗教法庭、宗教基金 (vakif)、宗教學院 (medresses) 等等，全部被廢除或沒收了，整個伊斯蘭體制都被摧毀。這是1924年3月初的事，上距「吉祥事變」，差兩年剛是整一個世紀。

馬穆二世為了「軍事神權國」的革新而被迫摧毀它的「近衛軍團」；百年後凱末爾為了民族的新生，被迫再摧毀帝國剩下的其他兩根支柱：蘇丹和伊斯蘭體制。他們從前人多次失敗所取得的教訓是相同的：必須透過毀滅才能獲得新生。

(丙)威權政治與新文化

在上述締造俗世化 (secular) 共和國的過程中，凱末爾被迫逐步和從前的親密戰友分裂，轉而倚靠另一批更崇信他、見解更一致的政治盟友：伊茲梅、法蒂 (Ali Fethi)、賽伊德 (Seyyit, 司法部長)、居卡爾。由於他的激進主張即使在人民黨內也居於少數，所以逐漸就發展出一種獨特的威權政治來。這威權並非建立在強暴手段或者有系統的意識形態之上，而是一種結合魅力領袖與政黨力量的槓杆式 (leveraged) 控制：以凱末爾個人

馬穆二世和凱末爾從前人多次失敗所取得的教訓是相同的：必須透過毀滅才能獲得新生。

圖 凱末爾在決勝關頭 (鄧魯平那之役, 1922)



的威望、決斷、理想來領導「核心分子」，然後通過他與「核心」的合作控制執政黨，再以黨控制國會和國家。這與開放政治或自由、民主精神相去甚遠，然而它的實施卻始終遵循西方議會程序以及司法制度，所以它和獨裁或極權政治其實又不一樣。

在這威權政治的基礎上，凱末爾用了大約十年(1924-34)來貫徹他深切的社會與文化革命^⑩。這包括提倡西式服飾、飲食、習俗等等，但最重要的，則是廢除伊斯蘭的國教地位(1928)；明令一年內以拉丁字母完全取代阿拉伯字母(1928-29)；將可蘭經翻譯成土耳其文(1931)；提高婦女的社會和政治地位(1926-34)；以及強迫使用姓氏，廢除舊式尊稱(1934)這幾項重大措施。同時，在文化上，則大力推動「土耳其主義」，這包括刪除阿拉伯和波斯詞彙、語法，重建純淨土耳其語；以新觀點研究民族歷史；發掘土耳其歌謠、故事，並且通過各種學術組織以及各地的成人教育和文娛中心加以宣揚、推廣。這「土

耳其化」的運動大體上相當成功，是能够配合「共和人民黨」推行政綱和發展基層組織的需要的。

以少數「革命先鋒」的意志與力量來全盤改造一個保守、落後、交通困難的國家，自然會遭到各種反抗。同時，早期革命元老也曾在國會內組織反對黨，希望以友好姿態監督執政黨。在威權體制下，這些對抗力量雖然好像微弱，然而凱末爾深知「槓杆式」控制的脆弱，所以不敢掉以輕心，因此都雷厲風行地(雖然並不殘酷，更談不上血腥)把它們鎮壓下去了。他的敏感不無道理：為了試驗民主，他在1930年鼓勵成立一個「認可」的反對黨——「自由黨」。結果，它意料之外的成功，使所有的人都大為震驚，三個月後這黨終於因為引起群眾暴動不得不自行解散。此後16年間，「共和人民黨」始終牢牢掌握政權，再也不敢放鬆。

1938年11月10日，在奮鬥了整整20年之後，凱末爾與他一手創建的土耳其共和國長辭。他生前即被尊為

圖 凱末爾高聳、沉重、拙實的陵墓：這也是土耳其舉行國家大典的「太廟」。



「土耳其之父」(Atatürk)，這自然是表示崇敬、仰慕之意。但它也可以有更深切的意義：因為，用存在主義的語言來說，他正就是把那個「哭着、喊着、掙扎着、老大不願意」的土耳其民族「強行拖進現代世界」的人。

三 從威權走向民主

土耳其建國甫告底成，世界便又陷入風暴：大蕭條、法西斯主義、國際共產主義以及第二次大戰接踵而來。這回，凱末爾和繼承他的依嫩努深深記取了馬穆與安伐的前車之鑒，堅決抵擋所有收復帝國失地(Irredentism)、接受極權意識形態、或者加入任何軍事同盟的誘惑，從而在武裝中立的政策下，將他們辛苦建立的共和國帶領渡過了1939-45這充滿危險和艱苦的六年。

但大戰結束後，如何從「保國」走向發展，從一黨專政走向多黨競爭，就立即成為主要課題了。這一轉變有三個誘因：第一，由於戰時須大量動員以維持防衛性中立(這政策一直維持到大戰結束前半年)，經濟非常艱苦，由是產生了對國營經濟政策的疑問，以及執政黨內反對力量的出現。第二，由於蘇聯不斷就東部領土和海峽問題向土耳其施加壓力，所以戰爭末期它被迫投向西方陣營，戰後更因為參加馬歇爾計劃，接受軍事和經濟援助(1948)，而受到美國政治壓力^①。第三，在伊嫩努的領導下，共和人民黨的確有意貫徹凱末爾原來追求民主的理想。所以，執政黨在1946年開放選舉，允許新出現的「民主黨」公開活動，並且在1950年第二次大選大敗之後，毅然自動交出政權，讓

「民主黨」代而執政。這難得的轉變固然受外在形勢影響，但自亞都默節朝的勒雪(Mustafa Reşit)以來，一個多世紀間英、法自由主義以及憲制思想對土耳其知識分子，包括凱末爾的深厚影響，當是主要因素。

可是單憑這種思想背景和主觀願望，甚至加上「聯進會」時代的短暫實踐經驗，並不足以將土耳其從精英統治順利引渡到民主和開放政治。因此，在過去40年間，土耳其又走過了相當曲折和崎嶇的路程，才達到目前的「小康」狀況：即人均產值每年約\$1600美元(據1989及1990年資料推算：這是中等國家水平)，政治上雖然仍有許多限制，但基本上自由、民主和穩定的狀況。在這40年間，土耳其所面對的政治問題主要來自三個方面：第一，政治上，在1922-50年間被人民黨強力壓制的各種社會力量，特別是社會主義和伊斯蘭教這一左一右兩種極端勢力，乘時崛起，不斷釀成暴亂，威脅顛覆國體。第二，經濟上，高速經濟成長和通脹壓力二者的矛盾，以及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利益衝突，始突難以解決。第三，體制上，國家控制力量與自由、人權保障的平衡點，以及政治權力的適當分配與制衡方式，都不易決定。總的來說，由於政治制度和社會的不成熟，一直到80年代初，土耳其都還無法在憲政體制以內解決這三類問題，因此一再出現社會秩序崩潰，招致軍人以「護國者」的姿態出面干預，並從頭開始新政體建立的嘗試。我們可以說，在二十世紀絕大部分時間，土耳其政治始終是在一個開明、寬仁但必要時會採取嚴厲矯正措施的軍權監督下摸索進步的^②。

開放政治在凱末爾時代只有人民

用存在主義的語言來說，「土耳其之父」凱末爾正就是把那個「哭着、喊着、掙扎着、老大不願意」的土耳其民族「強行拖進現代世界」的人。

在二十世紀絕大部分時間，土耳其政治始終是在一個開明、寬仁但必要時會採取嚴厲矯正措施的軍權監督下摸索進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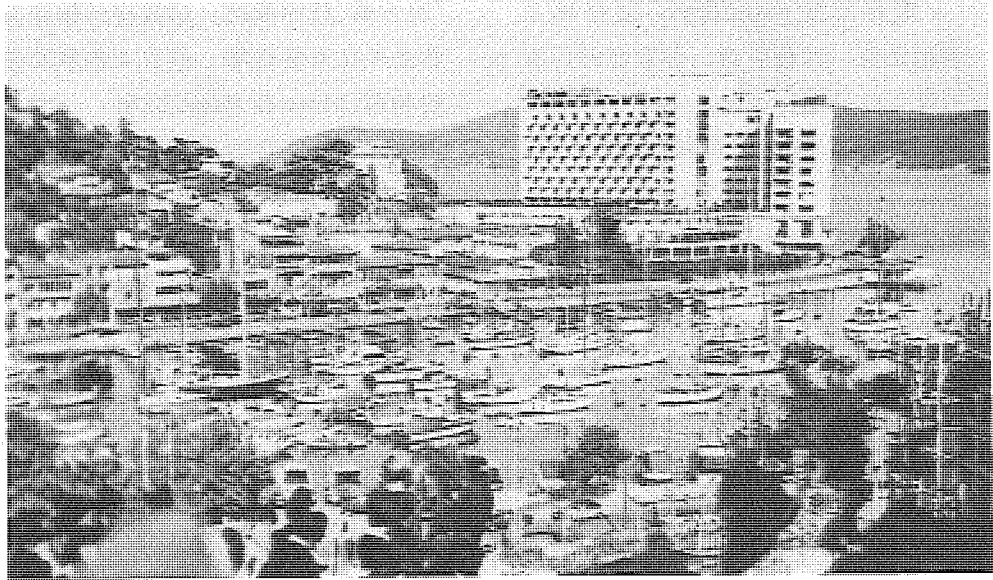


圖 伊斯坦堡近郊小鎮：遊艇和豪華酒店在作為「中等國家」的土耳其已不再稀奇。

黨內部分裂出來的「進步黨」(1924-25)和他自己泡製的「自由黨」(1930)這兩次曇花一現的嘗試。它真正的起點是1950年「民主黨」(也是由人民黨內部分裂出來)在選舉中以大比數獲勝，從開明的人民黨魁伊嫩努手中接收政權。民主黨以自由經濟政策以及開放、寬容的宗教政策獲得民衆熱烈擁護，同時也促成了大幅度的經濟增長。但執政大約五年之後，它就出現了問題：第一，它無法應付由高速增長造成的惡性通貨膨脹；更嚴重的是，它開始壓制言論，非法逮捕反對黨議員，大批更換公務員、法官、軍隊將領，企圖長期壟斷政權。這同時引起了知識份子的激烈反抗。結果，這第一階段的民主嘗試以1960年少壯軍人政變而結束。

除了清除和懲罰民主黨的罪魁以外，軍人政府最重要的成果是召集有廣泛代表性的制憲大會，訂定了一部由全民表決通過的新憲法。它糾正了1924年憲法(這可說是凱末爾為適應革命形勢而訂定的)將立法、行政等一切大權集中於完全不受約束的「國民大會」的弊病；規定設立上議院、

憲法法庭等制衡機構；並且增加了保障自由、人權、社會權利、以及高等教育自主的條款，以求促進和保障社會自由與多元競爭。

然而，多元競爭並不一定能保證進步。從1961至81年這二十年間，土耳其的基本問題，就是多元競爭造成政治意志癱瘓以及社會秩序解體。政治癱瘓的具體表現是，中間偏左的「共和人民黨」與較保守的「正義黨」(Justice Party，其實是民主黨的後身)這兩個主要黨派長期無法取得多數黨地位，必須通過與其他持極端主張的小黨(例如左翼的「革命工會聯盟」[DISK]，反西方的伊斯蘭組織「救國黨」，反共的「國家行動黨」等等)聯合才能執政。政府因此陷溺於政治角逐之中，不但不能推行有力的經濟、社會政策，甚至連嚴重的社會問題也不能解決。這樣，就助長了左、右兩方極端分子訴諸暴力、暗殺、恐怖手段以推行主張的傾向。

軍人因此在1971-73年再度干政，強迫各黨接受非黨派的聯合政府執政。但這並不能解決政治體制中的根本問題，那就是在經濟急促發展和

社會結構產生重大變革時，一個沒有威權的政府無從維持秩序。這樣，日益惡化的大規模暗殺和暴力事件至終再迫使軍隊在1980年第三度干政。它通過由軍事領袖組織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實施強硬軍事統治，壓制暴亂，前後凡三年之久，一直到頒佈了再度製訂的新憲法才將政權交回民選政府（但首任總統仍規定由軍人領袖 Evren 擔任）。新憲法的特色是再一次增強總統和政府的權力，並且對政黨的組織和活動加以周密控制。換言之，它是對1961自由憲法的一個修正：小心平衡多元競爭與國家穩定這兩個不同要求，可以說是這第三部憲法的特色。顯然，它比1924和1961兩部憲法更成熟了。

但土耳其的憲制和社會問題是否就已經永久解決了？今天，它是相當繁榮（但通貨膨脹達到每年70%！）、開放、穩定的，完全沒有任何再次發生政變或憲制危機的跡象。但它畢竟仍然是一個社會（這其中依然潛伏着強烈的伊斯蘭情緒）與國家意識形態（主要是由憲法規定的「俗世主義」）之間存有巨大鴻溝的國家。從長遠說，危機是否會再現，是難以逆料的。

四 現代化的兩面： 改良與激進

回顧長達三個世紀的奧圖曼和土耳其變革史，我們可以清楚見到這麼一個突出現象：虔奉伊斯蘭教的奧圖曼人雖然一再受到西方猛烈衝擊，但總企圖以最保守的態度來作最低限度的必要改良；然而，點滴改良始終趕不上時代和形勢需要，因此終於逼出威權領袖，以果敢、獨斷的態度實行

激進變革，以求擺脫困境，令國家進入新境界。毀滅「近衛軍團」，將「軍事神權國」改造為大一統帝國的馬穆如是：毀滅帝國，創造土耳其共和國的凱末爾亦如是：他們都自視為能够代表整個民族，作出這種扭轉乾坤的歷史性抉擇的人。

換而言之，在急速現代化的要求驅策下，保守的改良措施不能代替激進的整體變革，而只能成為後者的準備階段：反過來說，激進變革亦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在它創造的新形勢之下，自然產生另一系列改良運動。在這個模式中，「改良」與「激進」不復是現代化過程中兩種可以自由選擇的策略，而成為變革中互相關連，有密切啟承關係的兩個階段。借用庫恩 (T. Kuhn) 的語言（它描述社會現象也許比科學現象還恰當）來說，改良是在既定典範下運作的常態，激進變革則是創造新政治典範的非常態，兩者的交替出現有待於其內在條件與動力，並非當事人所得自由決定。

上面這個模式在奧圖曼歷史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十八世紀的五次改良失敗促成馬穆的激變，這激變啟動十九世紀的多次維新運動；後者的一再失敗促成凱末爾的整體革命，革命轉而引出了本世紀下半的民主化歷程。這整個過程在本文已經詳細論證了。但這個模式對其他國家又怎樣，它仍有意義嗎？這問題並非本文所能究及，但我們可以在此作一些簡略的觀察，以顯示奧圖曼例子更廣泛的意義所在。

第一，大部分現代國家似乎都曾經歷過激進、劇變的階段，這是應當正視的。例如被認為溫和改良典範的英國，在和平的「光榮革命」背後，就有長達二十年極端激進的「清教徒革

「改良」與「激進」不復是現代化過程中兩種可以自由選擇的策略，而成為變革中互相關連，有密切啟承關係的兩個階段。

命」以及將皇帝經過正式審判而送上絞架的史實。這是一段英國人後來認為「不光榮」的歷史，但正是由於它樹立的先例，才會有「1660年之事是國會所代表各階層的復辟，更甚於是皇上的復辟」的現象；亦正因此，斯圖亞(Stuart)皇朝復辟後，代表紳權的下議院才能够繼續掌握軍權和財權，為「光榮革命」奠定基礎¹⁹。

另一個被視為改良典範的例子是日本，這可能因為明治維新是以天皇名義頒佈和實施的緣故。然而，明治維新其實是以長州藩發動下級武士政變，控制藩主(1865)，以及倒幕諸藩的武士在京師發動政變，控制御前會議為關鍵²⁰；倒幕成功後，新政府在短短五、六年間完全摧毀了整個原有政治和社會體制，建立高度集權以及尋求全面引進西方體制與文化的中央政府。因此，明治維新和凱末爾革命一樣，是徹頭徹尾的激進變革。由於它保存了天皇這符號，並且變革成功，沒有引起長期動亂，因此往往被視為是與法、俄、中諸國的革命迥不相同的「改良」。但這看法是忽視「激進」、「革命」、「改良」這些詞語原有涵意義的。

第二，法國、俄國和中國的激進思想與變革往往被視為後來出現威權政治的根由。這看法可以從日本和土耳其的例子得到印證。但這兩個例子也正好說明，在現代化過程中，激進和威權政治往往是必要的，而且它們並不一定導致惡劣後果。單單由於激進變革在前三個國家的明顯失敗就直接或間接全盤否定它，似乎並不妥當²¹。也許，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激進」，而是在它的實質內容和施行方式。說得更具體一點，也許它之成功與否，端視乎它是否從切實的目標

出發，並且不斷根據實施結果修正；抑或是單純根據理論、理想推行，不顧及實際後果。例如凱末爾在1925年也曾建立一個具有掌握人民生殺大權的「獨立裁判庭」(Independence Tribunal)，以作為鎮壓庫德族暴動和反對勢力(包括大量顯赫政治領袖)的工具，弄得國內風聲鶴唳，一時頗有法國「大恐怖」時期味道。然而兩年之後，局面一旦穩定下來，他就撤消這機構，回到正常的法治途徑上去了。

第三，我們必須承認，理想與實際的界線難以確定，「改良」有明確準則可依循，「激進」則不可避免是帶有未知成分，也需要創造能力的一個「跳躍」(a leap)。這「跳躍」是成功抑或失敗，事後大體可以判斷，但到底是否完全「正確」，則難以斷言。這一點可以用下列對凱末爾革命的反思說明。

凱末爾整體改造土耳其社會、政治與文化的做法，在1922-24那幾年無疑被大多數土耳其人，包括多數國會議員，視為過分激進，甚至接近瘋狂。然而到1930年代，它的成功已大體明顯。倘若以同時代的德、日、意諸國和土耳其比較，那麼它們的威權政治形態都很相近。在當時看來，土耳其應該能够迅速發展，變得強大，但政治上則可能始終停滯在一黨或軍人專政局面。

然而，近四十年的發展卻證明，由於理想主義傳統，土耳其能够自動逐步從威權政治邁向民主政治，走完這個德國和日本都未能自行完成的艱苦過程。倘若單單看30年代的凱末爾政府，恐怕絕難相信他的「跳躍」之中包含了民主種子。另一方面，由於社會中的伊斯蘭傳統與國家的俗世主義

明治維新和凱末爾革命一樣，是徹頭徹尾的激進變革。

也許，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激進」，而是在它的實質內容和施行方式。

之間的深刻矛盾，近六十年來土耳其始終是一個「神經緊張」，甚至有點「神經分裂」的民族，這可以說是凱末爾所締造的這個共和國的「存在條件」(condition of existence)。這「神經緊張」在政治上表現於憲法處處掣肘政體與社會，黨派力量長期僵持對立，無從反映國民的共同願望(這甚至或者並不存在)；文化上，它的效果較難捉摸，但社會缺乏活力與取進、競爭精神，經濟發展迂緩，遠遠落後於遠東，這些似乎都與政治意志的分裂不無關係。換而言之，凱末爾創造了一個能躋身於「正常」現代國家之列的土耳其，但在靈魂深處它是抑鬱、不歡暢的；在將來，也看不出它回復昔日光輝的前景。

這就引到一個不可能有答案的核心問題了：凱末爾全盤否定從那覓·凱末爾到居卡爾一系列思想家調和伊斯蘭傳統與現代文明的努力，斷然以最大限度的「俗世化」與最低度的宗教空間作為建構新共和國的基礎。他這一「跳躍」雖然大體成功，但它是「正確」的嗎？他擺脫了歷史、傳統、宗教對土耳其的困擾；但同時似乎也窒息了土耳其人在文化與心靈上的生機。他有可能走另一條路，即是對伊斯蘭採取比較肯定和積極的態度，而建立一個更歡暢、更具有信心和動力的現代國家嗎？答案雖不可知，但還是惹人浮想的。

中國的歷史與現代化歷程和奧圖曼帝國並不一樣：中國未來的潛力與面臨的問題和土耳其差別更大。我們也許要慶幸，中國傳統中，並沒有像伊斯蘭那麼剛烈、不能妥協、難以與現代世界調和的成分。然而，誰能知道，我們悠久、豐富而無形的傳統，是否會成為我們這個民族更嚴厲的制

約——抑或我們可以利用它產生新的動力和創造力呢？土耳其的經歷，是值得深思的。

1992年1月於用廬

參考資料

Feroz Ahmad: *The Young Turks: The 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 in Turkish Politics 1908–1914* (Oxford UP, 1969).

Eleanor Bisbee: *The New Turks: Pioneers of the Republic 1920–50*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UP, 1951).

C.H. Dodd: *The Crisis of Turkish Democracy* (Hull, UK: Eothen Press, 1990 [2nd ed.]).

David Fromkin: *A Peace to End All Peace: The Fall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New York: Avon Books, 1989).

M. Heper & A. Evin (ed.): *State, Democracy and the Military: Turkey in the 1980's* (Berlin: Gruyter, 1988).

Uriel Heyd: *Foundations of Turkish Nationalism: The Life and Teachings of Ziya Gökalp* (London: Luzac & Harvill, 1905).

Lord Kinross: *Ataturk: The Rebirth of a Nation* (Nicosia: Rustem & Bros., 1964).

Ernest E. Ramsaur, Jr: *The Young Turks: Prelude to the Revolution of 1908* (Princeton UP, 1957).

Richard Robinson: *The First Turkish Republic: A Case Study in Nation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Harvard UP, 1963).

Elaine D. Smith: *Turkey: Origin of the Kemalist Movement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Grand National Assembly (1919–1923)* (Washington, D.C.: Judd & Detweiler, 1959).

Vamık D. Volkan & Norman Itzkowitz: *The Immortal Atatürk: A Psychobiography* (Chicago UP, 1984).

誰能知道，我們悠久、豐富而無形的傳統，是否會成為我們這個民族更嚴厲的制約——抑或我們可以利用它產生新的動力和創造力呢？

Donald E. Webster: *The Turkey of Atatürk: Social Process in the Turkish Reformation* (Philadelphia: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39).

註釋

有關奧圖曼帝國和土耳其的一般史實見上列及本文第一部分(載本刊第七期頁102-18)所列資料,除有特殊必要,以下不再徵引;本文徵引上述資料時以作者姓氏為指標(徵引本文第一部分所列資料時,則註明〔I〕)

① 凱末爾1925年8月26日在Kastamonu市政府的講話,由Volkan & Itzkowitz (p. 254)轉引M.S. Imec的記載。

② Kinross pp. 134-36; Volkan & Itzkowitz p. 110。

③ 大戰後同盟國的心態在Fromkin, Part VIII有深入細緻的分析。

④ 這個運動的詳細分析見Mardin [I]。

⑤ 奧圖曼語基本上是深受波斯語與阿拉伯語影響,並且以阿拉伯字母拼寫的土耳其語。由於受到外來語和外來文化的全面和長期的影響,它在脫離大眾這一問題上的嚴重性比中國的古文有過之而無不及。帝國內最早的白話文運動其實在1840年代開始,當時是由於要使大量士兵受正規教育而發現有此需要的。

⑥ 阿都哈密轉向獨裁有好幾個重要誘因,例如他以前的兩位蘇丹在一年內相繼被廢黜;大臣密赫的強硬政策引致災難性的土俄戰爭;密赫和國會都不肯合作通過他整頓財政的方案等等。但他親自掌握大權後性格亦逐漸變成極端疑忌、孤獨。

⑦ 「聯進會」時斷時續發展的經過見Ramsaur。1908年它在巴爾幹山區門那斯狄(Monastir)的起事完全是由一個會中的下級軍官無意中被識破而引起的,當時第三軍之中的「聯進會」成立僅兩年。因此事變成功後「聯進會」完全沒有執政準備。

⑧ Berkes [I]對此有極詳細的論述。

⑨ 這段歷史見Ahmad。

⑩ 居卡爾的事蹟與著作見Heyd以及Gokalp (Berkes, ed.) [I, 註①]。

⑪ Shaw & Shaw, Vol II, pp. 306-8 [I]。

⑫ Volkan & Itzkowitz, Ch. 11 對這一段極為關鍵而又充滿戲劇性的經過有詳細記載與分析。

⑬ 然而土耳其歷史學者頗有認為他在1919以前的種種事蹟(例如1909年4月他「負責」帶領第三軍入京平亂的事)被過分誇大渲染,多不足為憑。此點承博斯普魯斯大學歷史系教授Zafer Toprak告知。

⑭ 凱末爾和他同謀者在1919-23年間建立「國民政府」的經過以Smith的博士論文描述最詳盡,但策略的分析則以Volkan & Itzkowitz較有深度。

⑮ 凱末爾的個性與心理,特別是他的自戀傾向、伊底帕斯情結以及與眾多女性的關係,是和他的英雄主義與救世心態有密切關係的。Volkan & Itzkowitz是一部心理傳記,對此有詳細分析,它第十九章("The Sultan, the Mother, and the Oedipal Son")尤其值得注意。

⑯ 據Zafer Toprak教授的意見,他這些政策其實深受「聯進會」和居卡爾影響。

⑰ Robinson, pp. 137-41。

⑱ Dodd與Heper & Evin (ed.)有對土耳其近四十年間三次政變的詳細分析。

⑲ Christopher Hill: *The Century of Revolution, 1603-1714* (Edinburgh: Nelson & Sons, 1961), p. 222; 並見Ch. 14。

⑳ 長州藩的政變和由政變而成立的中央集權政府模式可視為整個明治維新的模式,見W.G. Beasley: *The Meiji Restoration* (Stanford UP, 1972), pp. 232-35。

㉑ 下列文章和這點有間接關係(因為我們在此並不討論法、俄、中激進思想的本身):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中的激進與保守〉,《香港中文大學廿五周年演講專輯》(香港1988),頁43-57;甘陽:〈揚棄「民主與科學」,奠定「自由與秩序」〉,本刊第三期,頁7-10(香港,1991)。

陳方正 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